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二十辑)

总主编 / 李玉明

魏文侯与李悝变法

董永刚
李国庆
著

战国初期，各诸侯国的变法革新此起彼伏。其中魏国的变法运动可以说是开战国时期变法运动之先河，在魏文侯主政实行变法的运动中，李悝作为战国法家学派的创始人，全面主持了变法运动，他以其卓越的治国才能和大胆的变法实践，对魏国的繁荣富强做出了杰出贡献。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 编:刘冬梅

张 熔

复 审:余超英

终 审:董高怀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20辑)

魏文侯与李悝变法

董永刚 李国庆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875 字数:300千字

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7-900434-01-1

G·52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 问：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领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壁
牛崇辉	田中仁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李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梁俊明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			

目 录

引 子	(1)
一、王权旁落与三家分晋	(2)
二、魏国疆界及其地理形势	(8)
三、魏文侯的治国方略及其思想渊源	(12)
四、魏文侯主政变法	(29)
五、改革家李悝与《法经》	(33)
六、魏文侯与李悝变法的现实意义	(44)
七、魏国的辉煌与没落	(47)

引 子

继春秋之后,我国进入了战国时期。战国时代是一个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的大分裂时代,但同时它也是一个上承春秋,完成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变;下迄秦,完成从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到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转变的伟大变革时期。

春秋战国之交,在一些沿袭商周以来形成的奴隶制封国内,部分新兴的地主阶级先后取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但新兴的封建制度此时还相当稚嫩,旧的奴隶制格局在各方面对新型封建政权仍存在很大威胁。加之,新兴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也表现的日益突出。各国地主阶级统治者为进一步革除残余奴隶制,巩固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加强封建制度的建设,都在不同程度地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等各方面进行了改革,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革新运动,从而完全在上层建筑中确立了地主阶级的封建意识形态。

在战国初,首先实行变法革新的是魏国。而魏国变法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变法运动的推行者和其实际操作者——魏文侯与李悝。

魏文侯及李悝的变法思想不仅在战国前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就意识形态领域来说,它对当时整个社会都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对后世亦影响深远。今天,我们讲魏文

侯与李悝变法，首先从三家分晋谈起……

一、王权旁落与三家分晋

晋国是西周王朝重要的同姓诸侯国，其开国君主叔虞为周武王姬发之子，周成王姬诵的弟弟，周成王即位以后，叔虞被封于古唐国，故历史上又称其为唐叔虞。叔虞死后，其子燮父继承王位，改国号为晋，从此始称晋国。晋国自西周初年立国到春秋末年为韩、赵、魏所灭，经历了约 600 余年。

春秋初期，由于晋公族（晋国君主的家族）的嫡系和旁支的斗争，晋献公曾大批屠杀许多近亲，使公族嫡系没有竞争的对手。晋献公死后，他自己的儿子们之间又发生了争夺君位的斗争，直到晋文公即位后，这种争权夺位的局面才得以结束。为了避免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晋国作了一条规定，不给国君家族的子弟以一定的土地与职位，这样在晋国就没有了公族，一切政权渐渐都归异支或异姓的卿大夫贵族掌握。后来，晋国又让卿族（卿大夫的家族）代替公族，诸卿、大夫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他们不仅广占晋国土地，把私邑作为争夺政权的根据地，而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地位都是世袭继承的。随着晋国诸卿、大夫势力的不断增强，他们逐渐控制了整个晋国的政权。

春秋中期以后，晋国的卿位一直由十来个卿大夫的家族所占据，居卿位的同时又是统率军队的将领。于是，这十

来个卿大夫的家族在晋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势力一天天的膨胀起来。到春秋晚期，由于诸卿大夫之间的不断互相吞并，晋国内部就只剩下了韩氏、魏氏、赵氏、范氏、智氏、中行氏六家最大的宗族，就是历史上所谓“晋国六卿”。

晋国的“六卿”是新兴的六支封建势力代表，在同旧的奴隶主贵族争夺政权的过程中，他们毫不把晋君主放在眼里，肆意扩张和分割晋国的土地和民众。当时，在晋国内部，由于旧贵族势力与新兴的封建势力、旧贵族集团内部长期不断的斗争、排挤和淘汰，原晋国的旧贵族势力也仅剩下了栾氏、羊舌氏和祁氏等寥寥可数的几家了。

在晋国，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兴起，并不意味着旧的奴隶主贵族主动放弃自己原有的特权，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旧的统治秩序，晋国旧贵族与“六卿”之间，发生了连绵不断的斗争。公元前550年，以范氏为首的新兴势力联合起来攻打当权的大夫栾盈。栾盈逃到楚国，不久又逃到齐国。齐国把栾盈等人偷偷送回其在晋国的私邑曲沃，想借栾盈来骚乱晋国。于是，栾盈从曲沃发兵反击，攻进晋国的绛都。新兴势力迅速调动武装，抢先占领了公室。在激烈的战斗中，参加战斗的勇士斐豹，向范匄提出要解除自己原来的奴隶身分。于是范匄就接受了斐豹提出的要求，烧掉了斐豹为官奴的卖身契，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奴隶们的要求。豹被释放后，由于受到新兴封建势力的鼓舞，他积极参加了反对旧奴隶主贵族的战斗，杀了栾氏的力士督戎。范氏为了彻底战胜栾氏，还发布命令说：“自文公以来，有功于国家子孙还没有为官的，可以做官和受赏。”这种奖赏政策，大大鼓舞了士

气,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因此决战的结果以栾氏惨败,其党羽全部被诛杀而告终。

栾氏之乱被平以后,旧贵族集团中的胥氏、原氏、狐氏、续氏、庆氏、伯氏等相继被降为奴隶或平民,渐渐地都没落了。看到日渐失去往日光华的守旧派大夫叔向由衷而叹说:“晋之公族尽矣!”“政在家门,民无所依!”新兴势力在灭栾氏时,又以摧枯拉朽之势灭掉祁氏、羊舌氏,将祁氏的领地分为七个县,羊舌氏的领地分为三个县,并任命韩、赵、魏等族的子弟和有才能的人去这些地方做县大夫。旧公族的消灭为晋国社会的向前发展扫清了障碍。

在晋国新旧势力相互攻伐的同时,新兴封建势力之间的激烈兼并也在不断地进行。为了迅速提高自己的经济、军事实力,扩大各自的统治领域,当时以六卿为代表的新兴势力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提高生产力的革新措施,但实行的程度和方式方法各家却有较大的差别,其中范氏、中行氏在自制的改革措施上就显得很不彻底,而且还较多地保留了奴隶制的印迹,对依附于他们的农民剥削的非常重,致使民怨四起;在政治上,他们又往往独断专行,所以在与赵氏等进行的斗争中自然处于不利的地位。相比之下,韩、赵、魏三家的改革就显得较为彻底。象赵简子就非常注重争取民众,采取了奖励军功、以功释放奴隶的措施。有一次他派尹铎去作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的地方官,尹铎问:我去之后是象抽丝那样榨取民脂民膏呢?还是建立一个可靠的根据地呢?赵简子说:当然要建立根据地。后来尹铎到任后,积极调整对农民的各项政策,并减少了农民的负

担,使得晋阳成为赵氏可靠的根据地。

公元前493年,韩、赵、魏三家联合向范氏、中行氏等发动进攻,当时赵简子果敢采用赏罚分明的军事制度,士气倍受鼓舞。赵简子还善于选拔贤能,表彰敢于指出他过错的臣下,他曾说:如果遇事都唯唯诺诺,那就离亡国不远了。由于政策合理,人心所向,在以后的屡次交战中,赵、韩、魏集团每次都能取得胜利。公元前490年,范氏、中行氏集团失败,逃出了晋国。中行氏在奔逃前仍然没能省悟到自己失败的原因,反而指责是他的祭神祭祀时用的猪牛羊不够肥美,才招致灭亡。

范氏、中行氏败逃后,赵简子据有邯郸,其他地方为晋公室所有。公元前458年,赵简子去世,智氏卿族的智瑶(智伯)被立为执掌国政的正卿。智、韩、赵、魏四家联合起来要分占原先属于范氏、中行氏的地方,由于晋出公不肯,四家就赶跑了晋出公。智伯另立晋哀公为“君”,自己把持了朝政,将范氏、中行氏的故地据为己有。此时,智、韩、赵、魏四家成为晋国最强的势力。

当时这四家当中,以智伯势力最大,他想独吞晋国,但这势必会引起韩、赵、魏三家的不满,所以,要想独揽晋国大权,首先必须考虑如何削弱这三家的势力。首先他以奉晋侯之命,兴兵伐赵、恢复霸主的地位为借口,要每家拿出一百里的土地和户口归“公”。其实这时候的“公家”也就是“智家”。可这时的韩、赵、魏三家心里又都各有打算,没法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智伯瑶,无奈之下,韩康子、魏桓子只得如数向“公家”交出土地和户口。智伯在轻而易举地取得了二

百里的土地和户口之后，紧接着他又派人去找赵襄子索要相应的土地和户口。但赵襄子口气却很坚硬，他说：“土地是先人的产业，我哪能随随便便就拱手将其送给别人呢？”于是，气急败坏的智伯就联合韩、魏两家一同出兵去攻打赵家，并且答应他们灭了赵家后，赵家所有的土地和户口由三家来平分。

公元前455年，智、韩、魏三军人马直奔赵家。赵襄子知道自己寡不敌众，于是采用了谋臣张孟谈的建议，决定选取晋阳作为可靠的固守点。他认为，晋阳既是赵国原有的领地，又经过董安于、尹铎等人的苦心经营和治理，必定物阜民丰。但到晋阳一看，却是城廓不治、仓无积粟；府无储钱，库无甲兵，如此景象令其大为惊恐。而这时候，张孟谈却说，圣人治理国家靠的不是府库，而是靠民众的支持，只要民众手里有东西，又肯于支持，就是最好的条件。为此，赵襄子才决定迁居晋阳。

不久，智、魏、韩三家的兵马就开始围攻晋阳城。由于赵家士气旺盛，民众一心坚守城池，双方在晋阳城外僵持近两年，不分胜负。到了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453年，智伯想出一条办法，他下令把晋水改道西南，用水淹晋阳城。不到几天，水流满了晋阳城。但赵军却宁可淹死，决不投降。另一方面，赵襄子派张孟谈偷偷潜出晋阳城去拉拢韩、魏两家。张孟谈对韩康子、魏桓子说：“唇亡齿寒，赵亡以后，灭亡的命运就轮到你们了”。加之韩、魏两家的参战本来是被迫的，又见智伯专横跋扈，考虑到以后智伯得势，势必危及自己的安危，从自身利益出发，决定反戈投向赵家，与赵襄子一起

来对抗野心勃勃的智氏。于是，韩、赵、魏三家联合用水反攻智伯，淹了智伯的军营，智伯想趁乱驾舟逃遁，结果被俘杀掉了。接着赵襄子又灭掉了智氏一族，赵、韩、魏三家平分了智氏原有的土地和户口。从此，四卿并立的局面由三卿取而代之。

公元前438年，晋国的国君晋哀公死了，儿子晋幽公即位。韩康子、赵襄子、魏桓子见新君软弱无能，就商定平分晋国。他们除了把晋国的绛都和曲沃两座城留给晋幽公外，其余的地方便由三家平分了。此后，韩、赵、魏三家就各自独立，晋幽公只好在三晋势力的挟持下存活，晋国的君臣地位就此倒挂过来了。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通过周天子威烈王的册命成为诸侯。公元前376年三家再次联合起来进一步把晋国挂名的国君废为老百姓。从此，西周以来兴起的晋国在历史上就消失了，代之出现的是新兴的韩、赵、魏三国，由于韩、赵、魏都出自晋，所以又统称这三国为“三晋”。

三家分晋后，中国的历史进入战国时代，相对诸侯争霸的春秋乱世，七雄并列的战国时期斗争更为激烈，社会变革更是波澜壮阔，但同时，激烈的兼并战争也加速了我国古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间的政治和文化交流，促进了国家大一统时代的到来。

当时，经过春秋乱世“弱肉强食”的长期激烈兼并，大多数弱小的诸侯国一一被历史的洪流所淘汰，仅存的也只是苟延残喘；名存实亡的周王室此时完全被降为下等小国，最终于战国末年为秦所灭。此时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只有齐、

楚、燕、韩、赵、魏、秦等七支较为强大的力量。他们之间继续相互攻伐，激烈角逐，直至战国末年，秦一统天下，中国历史迈入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

二、魏国疆界及其地理形势

在中国历史上，史家习惯上将“三家分晋”视为春秋与战国分界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而魏国的崛起则更是以次为契机在不断的改革与发展中一步步走向了战国初期独霸中原的地位。

翻阅春秋时期的晋国史料，可以说，在春秋时期的晋国各卿大夫中，魏氏一族并非象赵氏家族一样声名显赫，更没有象赵简子一样的“简襄功烈”，但是自三家分晋，历史进入战国时期后，魏国却率先迅速崛起，并一举成为统领中原的霸主，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但考其发起的经过，我们不难发现，魏国的迅速崛起除了其较为优越的地理环境等客观因素外，更重要也更值得称道的还应当是其独特文化个性和不朽的人事之功。

《战国策·秦策》中讲，魏之地是“天下之胸腹”。透过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发现，魏国的地理形势对其自身的发展和个性文化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魏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翻开中国古代的历史地图，从魏国的疆域沿革上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魏国的疆域比较分散，主要由东西两

大部分构成。其西部是以安邑(今属山西夏县)为中心的山西省南部地区,称“河东”;东部则是以大梁(今属河南开封)为中心的河南省的东北部地区,称“河内”。因此,我们可以说,魏国的东西两块疆域,基本上都属于当年晋国的本土。因为,三家分晋时,魏国获得了当时被称为“河东”之地的晋南大片领土,即魏国的西部疆域。三家灭晋以后,晋国的都城新田以及其第二大都邑曲沃也为魏国所有。属于魏国东部疆域的豫北地区,也主要来自晋文公时期的晋国领地,是晋文公平定太叔带叛乱后,周襄王赏赐之地,时称“河内”。在魏国发展的前期,西部是其主要的活动基地,而中后期的活动重心则转向“东地”。魏国东西两地之间以上党地为连接点,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魏国疆域沿革的这一历史特点,对于魏国自身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三家分晋后,魏国自立国之初,仍长期被人们称作“晋国”,而当时的魏国也常以“晋国”之尊自居,晋国原有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等在客观上势必对魏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特定的影响。

经济是政治发展的基础,一切强大的政治和军事都要由坚实的经济基础为依托和保障。从经济上讲,魏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土地平坦肥沃,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交通十分便利。这里自古就具有发展农业生产、铸造农耕文化的自然便利条件。据史料记载,当时的魏地,农业生产相当发达,五谷遍地,几乎没有可供放牧的闲置荒地。加之,西部的河东地区,煤、铁、盐等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交通南北,贯通东西。相当优越的自然条件为魏国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使得

魏国人口繁盛、物产丰盈，处处呈现物阜民丰的荣昌景象。战国时期的著名纵横家苏秦在分析了魏国地理形势的战略意义后就说：“魏国，是天下的强国啊！”他的话旨在提醒魏王要充分利用和发挥魏国自身有利的地理环境和战略优势，抓住有利条件发展自己，这样，魏国就会成为长期雄踞中原的天下强国。

从政治和军事上看，魏国地势相当的平坦，没有高山大河的阻隔，尤其位于“东地”国都大梁一带，这种地理特征则显得更为突出。平坦的地形特征一方面非常有利于魏国向外拓展自己的领地，但同时也有其被动的一面。首先，要想向外拓展自己的疆域，那就必须保证自身的强大。只有国富民强，才能在其四周屯驻重兵，戍守边境，以固若金汤的防备来抵御外来的入侵，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其次，也只有国力强大而无内患的基础上，才能守土开疆，不断向外拓展自己的领地。而与此相反，一旦本国内部破败，国力衰弱，内无法安民，外又无力御敌，四方强者就会趁机而入，弱肉强食的局面就在所难免。

特殊的地域环境，一方面为魏国发展原有的中土农耕文化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促进了其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其平坦无掩的地势特征也给魏国的守疆扩土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促使魏国必须不断改善和优化本国政治、经济制度，使自己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方面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客观事实和现实状况的双重因素加快了魏国的改革进程，而承担起引领魏国走向繁荣乃至独霸中原使命的当推魏国的开国君主魏文侯。魏文侯是魏国历史和文化的奠基

人和开拓者，在他统治魏国的 38 年间，其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审时度势、务实求进，以大有为的政治家眼光和气度，变法革新，富国强兵，使魏国一跃而成为战国初年的头号强国。由于魏文侯超凡的治国方略和政治魄力在战国时期的深远影响，后人司马迁在《史记·魏世家》称：“文侯由此而得誉于诸侯”。

魏国在魏文侯在位时期，进行了一系列的变法和改革。西周以来的奴隶制体制至春秋时代已进入衰落阶段，作为奴隶社会经济基础的井田制日趋瓦解，封建制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原先旧的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客观上要求加快对旧的生产关系的革新。

春秋后期，虽曾有鲁国三桓、晋国六卿、齐国田桓等取代旧的统治者的事件发生，但他们并未真正推出一系列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革命性措施，而只有魏文侯执政以后，魏国在其统治下所采取的一系列变法活动才真正称得上是一场新的革命。魏文侯的改革和变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改革不仅加速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为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辟了道路，而且促进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三、魏文侯的治国方略及其思想渊源

(一)尊儒尚仁的儒学风范

魏文侯不仅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家眼光,而且饱含博大宏伟的政治家胸怀。法儒并济是魏国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

魏文侯在位期间,一方面,他起用了李悝等一批著名的法家人物革新图治,收到了富国强兵的卓著成效,将法家思想在魏国运演的淋漓尽致,法家思想充分显示了其特有的威严性,从而使法治文化在魏国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另一方面,魏文侯对儒家学说又高度推崇。他礼贤下士,广纳人才,拜孔门弟子卜子夏为师,力主推行儒法并行的治国的方略,使得儒法两家的思想在魏国得以相互融洽,相得益彰,为魏国封建政权的巩固和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法治保障。魏文侯的这一治国之道在当时的战国可谓独树一帜,而这又归因于魏文侯“好学”与“求进”的治学态度和谦恭礼让、务实创新的优良品质。

魏文侯(?——公元前396年)战国时魏国开国国君。名斯,谥文,魏桓公之子。公元前446年——公元前396年在位。其先祖于武王伐纣后,因功被封于毕地,于是就以毕作为自己的姓氏,叫毕公高。后又有一叫毕万的,因晋献公十六年(公元前661年)率兵攻伐霍、耿,有功于晋,于是被封于魏,遂以魏姓代毕。毕万的儿子魏武子,随晋文公重耳出

亡19年，是晋文公的大功臣。魏武子的孙子魏絳，即是后来提出和戎之策，使晋八年之中九合诸侯的魏庄子。魏絳之孙魏献子，在晋顷公十三年（公元前514年）与赵简子、中行文子、范献子并为晋卿。魏献子之孙魏桓子，与韩康子、赵襄子共灭智伯而分其地，在晋国势力愈来愈大。魏文侯即魏桓子之子。

魏文侯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历受晋封的世家。因其家世显赫，加上他的才能和威望，便被周天子加封为诸侯，从而为其取代晋国奠定了基础。到其子武侯的时候，终于与韩、赵合兵三分晋地，建立了魏国。魏氏家族，从庶人到卿大夫再到诸侯的不断兴盛，使得魏文侯自然怀有青云之志。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又正好给他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实现政治抱负的政治舞台和活动空间。

司马迁在《史记》中将魏文侯归入《儒林列传》，并说：“那个时候独有魏文侯好学。”所谓“好学”，即指的是对当时儒家学说的尊崇，这是儒家学者的生性本色，当然也是做一名贤明国君的客观要求。《史记》中还多次记述了魏文侯向孔子的得意门生卜子夏请教礼乐经艺之事。子夏替他分析古乐与新乐之别，并以乐喻道，借讲音乐之事，向他灌输儒家思想，传授为君之道。田子方、段干木皆出子夏之门，为孔子的再传弟子，此时都被魏文侯视为良师益友。《史记·魏世家》称田子方为“文侯师”，《淮南子》中亦称段干木为“文侯师”。《资治通鉴》中也有关于文侯尊子夏、田子方及段干木为师的部分描述。其中说魏文侯每次出门路过名士段干木的住所必定低头，手扶车前衡木，以示尊敬，所以四方贤